

GUDIAN SHUYUAN

DE ZHONGJIE

JI QI DUI XIANDAI ZHONGGUO DAXUE DE YINGXIANG

古典书院的终结
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

黄英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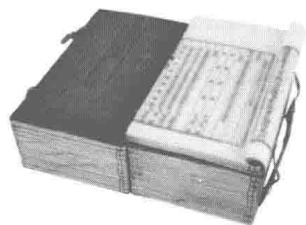


人
民

教
育

社

黄英杰◎著



古典书院的终结 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苏向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 / 黄英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01-017863-9

I. ①古… II. ①黄… III. ①书院—影响—高等教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9920 号

古典书院的终结及其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影响

GUDIAN SHUYUAN DE ZHONGJIE JI QI DUI
XIANDAI ZHONGGUO DAXUE DE YINGXIANG

黄英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17863-9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我魂牵梦系的家乡，另一个便是我倾注了大量研究心血的民国。

我生活的故乡时常会悄无声息地浮现在我脑海，成为我思考教育的潜在背景或底色。故乡的山水人情弥漫于我的教育之思中，织就了教育之网的美丽框架和情感纹路。儿时的故乡很美，四季更替，花开花谢。春天变暖时，燕子等各种鸟儿筑巢生子，临至深秋，它们又纷纷南飞。农忙时，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哪家农活急，总会有人前去帮忙。麦熟的季节，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麦香，金黄色的麦浪洋溢着收获的热情和希望。到了冬季，各家都点起炉火取暖，一到晚间，村民们走家串巷围炉夜话，炉火把脸庞映照得微有红意。海德格尔说，“返回故园”。又说，“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正是这最初的儿时生活，给了我判断教育之善恶的基本经验，也使得我的教育之思游走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既不会庸俗也不会蹈虚。我相信，善的教育一定是使乡村更宜居、更加和谐美丽的教育。

民国是我的精神故乡。与民国大学及其学者的精神交流，让我有一种强烈的体认，民国大学是民国学者的精神圣地。民国学者的思想和知识人格在大学里形塑，他们的命运、大学的命运，以及国家民族的命运相互重叠交织。民国学者相信，教育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大学问，是社会和政治改造的基础。他们学贯中西，博学约礼，以思想和学术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鲜活的智力资源，倾情致力于民族再造、社会改善、国家振兴之事业，成为其时代的引领者。我坚信，认识和理解民国大学，继承其宝贵的

精神遗产，借以唤醒当代中国大学的卓越意识，重塑中国大学的文化担当，是一名中国高等教育学者的文化使命。

教育的叙事总是出自叙述者自身的经验，故乡决定了我对教育思考的视阈。

在故乡精神的烛照下，我凝练出了本书的主题，即古典书院与现代中国大学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中国古典书院观：中国古典书院是一个以文明再造精神为核心，以书院学规为基本制度构架，集文明绍继、大众启蒙、社会批判和学术研究等诸多功能于一体，和合教学与研究的高等教育组织。在此基础上，我从理念、制度和精神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古典书院对现代中国大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最后聚焦于中华民族的文明更新与再造上。顺着理论本身的逻辑，本书也试着探讨了一种新文明存在的理想形态。当然，书中所提出的新文明理想形态也只是一种学理上必要的“乌托邦”而已，祈愿慧者识之！

为学辛苦自家知。除文责自负外，仍祈贤者、方家给予批评指正，以求有改善之可能。

最后，本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团队（2015—2017）”的资助，也得益于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向所有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同仁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黄英杰

2017年2月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中国古典书院的终结	001
第一节 古典书院终结的内涵	003
一、古典书院终结的历史情境	003
二、古典书院的终结	009
第二节 古典书院观的精义	012
一、中国古典书院观	012
二、中国古典书院的性质和精神	014
三、中国古典书院的职能	016
四、书院学规的制度分析	033
第三节 书院转型的理论基础及路径选择	037
一、“中体西用”理论	037
二、书院变学堂的大学谋划	043
第二章 古典书院观对现代中国大学理念的影响	049
第一节 现代中国大学及其对德国大学观的借鉴	051
一、现代中国大学的概念辨析	051
二、现代中国大学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接受	052
第二节 现代中国大学理念的构成维度	070

一、“允公允能，建设一个民主国”	070
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078
三、“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093
第三章 古典书院观对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	103
第一节 学规变章程的制度表达	104
一、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大学愿景	104
二、现代中国大学的制度建设	113
第二节 古典书院在大学制度内外的努力	125
一、书院想象与现代大学学术研究肇始	125
二、整理国故与清华国学院的建设	130
三、大学制度外书院的象征	136
第四章 古典书院观对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影响	145
第一节 理学的哲学化与中国文明精神重铸	146
一、理学的哲学化与现代中国大学哲学的兴起	146
二、哲学对中国古典文明精神的阐发	150
第二节 诗的新文学转化与大学的新人文精神	156
一、诗教传统与大学新文学启蒙运动	156
二、新文学启蒙与民主科学精神的建立	164
第三节 独立自由精神的传承和坚守	175
一、王国维自杀的教育叙事	175
二、大学独立自由品格的彰显	180
第五章 创造新文明：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	189
第一节 现代中国大学的文明再造	191
一、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	191
二、创造一个新文明	198
第二节 现代中国大学的内在矛盾	205
一、古典文明与大学组织之间的矛盾	205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	212
三、大学与个体之间的矛盾	217
第三节 大学的基本性质与古典书院的启示	222
一、现代中国大学的基本性质	222
二、中国古典书院的当代启示	228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3

第一章 中国古典书院的终结

中国古典书院是中国文化自身生发的一种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存在了一千余年，对中国古典文明的凝练、提升、持存和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近现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加之西方国家携带武力与野蛮的文明入侵，^①书院教育制度在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角逐中逐渐显露出它的弊端和弱势，并最终走向了“终结”。然而“终结”并不仅仅意味着书院因其不合时宜走向“完结”或“结束”，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上，它表示的是书院这一教育组织形式以往全部教育能量的“聚集”或“呈现”，同时还意味着其“聚集”的能量会以新的形式在新的教育制度变革中“转化”或“新生”。毕竟，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书院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并不是一堆无人问津的死东西或仅供观瞻和考古的文明遗迹，它既然是一个文明的精神产物，其中必然存在着普遍的教育精神，这一普遍的教育精神既是新教育精神创生的“引导性材料”，同时也会经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新教育精神的“构成性基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教育的人性本质，

^① 苏珊·桑塔格说过，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自以为是的欧洲文明借武力和霸权强势推行自己的文明，并把其殖民行为美化和粉饰成“对野蛮的抵制”，以及“延伸了文明的道德边界”。文明借野蛮而扩展，这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文化事件。参见[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

探究书院精神本身也就是探究内在于文明本身的我们自身的生成。通过对古典书院的教育叙事，我们拈出了中国古典书院观，即中国古典书院是一个以文明再造精神为核心，以书院学规为基本的制度构架，集文明绍继、大众启蒙、社会批判和学术研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和合教学与研究的私立高等教育组织。

当然，古典书院在“澄明”自己的教育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也展示了其必然要发生转型的理由及条件。就其理由而言，古典书院与中国古典文明是一体化的存在，它的重点在于德性人文精神的养成和陶冶，其课程科目主要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培养的是服务于古代农业社会及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有德行的君子式人才，它与建立在近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现代教育是根本不同的。现代学堂的课程文化分别归属于人文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是一种与现代工业社会分工相对应的专业分科性质的文化，旨在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多元化人才。现代社会的工业性质使得现代学校教育更加强调实用科技型人才和经济管理型人才的培养，导致人文道德性质的课程边缘化。当两种教育制度——书院教育制度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彼此“遭遇”时，“激于道义”的书院制度必然败于建立在为“获得贱买贵卖特权”基础上的功利化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尤其是当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携武力和炮火大行其道时，就更加凸显了“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的人文教育的悲剧性处境。^①这种残酷遭遇使得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教育解读，即归咎于古典教育制度的落后，在这种情境下，书院教育制度的转型是其必然的逻辑归宿。就其条件而言，中国古典书院在其长期的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聚了大量的教育能量，这是它转型的有利条件。在“中体西用”理论的导引下，这些教育能量必然沿着文明的惯性，要么在其旧的教育制度内部，要么在其之外，实现新教育的转型，至于转型的方向和结果，要看历史和现实给予当时的中国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会和教育什么样的具体机遇。中国古典书院和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史已经表明，书院已转型，它已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现代大学所昭示的方向，且渐行渐远。

第一节 古典书院终结的内涵

一、古典书院终结的历史情境

（一）甲午海战的教育蕴含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来说，1894年极具象征意义。在这一年发生的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败于日本海军。1895年4月17日，日本用枪炮逼迫大清帝国签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马关条约》，勒索白银两亿两，强行割去台湾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等大片中国领土。军事上的战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心理震动。大清光绪帝感觉到其政治权威和统治基础受到了根本挑战，“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①。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②时隔两月有余，浙江学政徐致祥上奏则说：“今日中倭之事，战不成战，和不成和，实古来未有之创局。”“今倭一海岛小国，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③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就对中国的危机情势作过一个判断，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三六，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第3320页。

②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2页。

③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中华书局影印本1996年版，第643页。

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①对于这一极具世界眼光的看法，诸多中国现代史学家曾给予很高评价，李鸿章也因后来的一系列洋务作为成为“中国洋务的主要设计师及倡导者”^②。然而他的应对之策却仅限于在经济上与外国人立约通商用利益加以笼络，在军事上以制造轮船、枪炮的“洋务”自守自强，仍然属于保守主义的政治策略，虽有眼光却无实际操作之才具。囿于政治的局限，李鸿章并没有看到立于强大军事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要建立一个好的经济制度首先要有优良的文教制度。所以，当郭嵩焘告诉李鸿章，“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③，李鸿章却自负地把国人积弱积贫之状作了另外的解释，“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④。显然，文教制度的根本改变，对李鸿章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他不可能“作更大和更远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造”^⑤。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及其同时代日本的伊藤博文时说，虽然伊藤博文于日本之地位远不及李鸿章于晚清朝廷之地位重要，然而在两件事情上伊藤博文却占据优势，从而使得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对于各自民族的文明史之价值判然分别。一是伊氏“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二是“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李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⑥。很显然，这两条都直接与教育和学术相关。现代教育给予伊藤博文政治的视野和识度，也使得日本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经国治世的现代化人才。梁启超敏锐的学识和判断把我们引向甲午前后的日本教育制

①（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2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②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③ 转载自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4页。

④ 同上。

⑤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⑥（清）梁启超：《李鸿章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95页。

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把战争的根本原因归于教育的落后在当时是有着普遍认同的，比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自述，“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①。正是中日甲午海战震动了中国的知识人，促使他们审视中国的教育制度并志于寻求变革之道。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在1894年的《大同书》里较为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教育制度的雏形：学校的宗旨以开智慧为主，“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学校的教育阶段从幼儿一直达到成人，“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关于教育的内容，一是政治批判，“其时学校所教，时时公议改良”。二是实用为主，“若其公理乎，则德教、智教、体教之外，以实用教为最重，故大学科专行之”。经过这一教育改造，最后达至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道德完善、社会大同的理想境界，“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②。应该说，康有为的这一理想教育蓝图，正是1898年戊戌变法之政治和教育变革的先声，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包括书院在内的变革的大门。

（二）“和魂洋才”的教育启示

由上所述，日本的强大主要源于日本先进的教育和政治制度。然而，日本的教育并不是一直都比中国的教育制度优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日本的教育和政治制度远远落后于中国。日本教育和政治的发达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在早期阶段日本主要学习法国的教育制度。通过模仿法国的大学区制，日本建立了一套新的文教制度，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和留学生教育。新的教育法令实施十年的时候，“日本有小学29081所，中等学校194所，高等学校21所，大学1所。小学的数量几乎与今天的相等。”^③正是这种内外相交、上下打通的优良文教制度为日本培养了众多的现代化

^① 王国维：《中国现代美学名家·王国维卷》，聂振斌选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② （清）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8页。

^③ [日]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徐锡龄、黄明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优秀人才，也为后来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储备了深厚的智力和人才资源。

一般说来，优良的教育制度背后必是先进的教育思想。详查日本明治维新教育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支撑日本近代教育制度构造和实践的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杰出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和魂洋才”教育思想理论。

所谓“和魂”，指的是日本人的新民族精神。这一新的精神与建基于旧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之上的传统道德观相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平等之独立精神。福泽谕吉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但却又有高低贵贱的分别，这种等级的区分不再是建立在出身、种姓或阶级阶层的基础上，而是学校教育的结果。“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①这样，福泽谕吉就在逻辑上把人的高低贵贱置于了知识的基础上，有知识者贵，无知识者贱。顺此逻辑，渐渐地就会在社会上兴起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和研究科学的良好风气，以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普遍社会心理氛围。这种知识优先的文化心理氛围无疑会对社会的改进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通过教育修学储能，士农工商各阶层就可以各尽其责、各守其分，基于天理、顺乎人情，置产兴业，在此基础上个体则可以达至完全的自由和独立，进而有家庭、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把独立精神和能力看作人类文明的归宿，是福泽谕吉的一个洞见。在福泽谕吉看来，缺乏独立内核的文明是假文明，文明不可以从外面输入，真文明需要内在的自我生成。大学由外国教师主教，工业依赖外国的资源，商业随附于国外市场，外交受到外国的干涉，等等，都不会有真正的文明，最多只能算是外国“文明的侨居地”^②，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奴化。所以，平等、自由和独立诸因素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核心构成要素。新的文明需要新的教育，反过来说，只有新的教育才会造就一

①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郡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

②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3页。

个新的文明。就这样，福泽谕吉建基于平等、自由和独立基础上的新教育观，以及建基于新教育观基础上的教育实践开启了日本近代社会文明进步之门。

其次，是相互协作的智德。福泽谕吉认为，“智德”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词，它大体可分为四种：“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第三，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作私智。第四，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作公智。”^①在这四种智德中最重要的是公智和公德。虽然私德私智对于个体和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它们，公德公智就无从建立，但是公德和公智对于社会的整体文明却是至关重要的。举例来说，一个李鸿章即使其私德私智远在伊藤博文之上，然而单个的李鸿章无法决定整个晚清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千千万万个伊藤博文却表征了日本社会的整体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教育最高的文明价值和功用恰在于它的教育的普及性，以及它对社会公德和公智的陶冶和养成。就个体而言，通过教育培养相互协作的智德就变得非常重要，只有道德和智慧相结合才会成就完整的人。就社会的总体考量，平等个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社会各项活动，才会造就一个社会的真文明。

最后，是知行合一的精神。福泽谕吉对汉学的弊端和危害有着明确的体认，他认为，主仁义道德修养的汉学主要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内在于心而无法观察，二是容易陷于个体品德的修养而流于私。这种学问容易使学习者务于内在的体验而疏于外在的行动和探究，割裂了知识与行动的合作关系，也使得社会群体的有效协作几无可能，在面对西洋文明的挑战时自然会处于劣势。新民族精神反其道而为之，更加强调行动。一个行动无论轻重难易、效果大小，皆需考虑周全，以思想作指导，两者合一互

^① [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73 页。

动。新文明的创发是在有思想指导的行动实践中建设成的，坐而论道或者是盲目的实践只会导致文明的衰落。“促进文明的要领，在于尽量使各种事务繁忙起来，各种需要不断增多，不问事物的轻重大小，多多益善，从而使精神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①

所谓“洋才”，指的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在内的整个西洋文明。它包括西洋的器物、技术和建筑等“外形的文明”，更包含西洋精神的“内在文明”。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明确阐释了这一思想：“试看西洋各国的进步情形，其各种各样的电气和蒸汽机器，没有不是日新月异竞相改进的。岂但有形的机器为然，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愈开，则交际愈广，交际愈广，则人情愈和，因此就用国际公法来限制战争。同时经济之学日盛，政治商业之风一变，学校的制度，著作的体裁，政府的措施，和议院的会议，都愈改愈精，全无止境。”^②

根据自己的文明观，福泽谕吉提出一个“文明开化”的概念用来判断文明的开化程度，他把文明分为野蛮、半开化和开化三个逐次递进的过程。福泽谕吉认为，亚洲的文明是半开化的，而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文明是最为开化的，日本要变得文明富强，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脱亚入欧”。为此，在教育上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学术和教育理念，树立新的学术和教育价值观，即“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作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③。学术和教育应该有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要以“实学”为首要任务，“我们应当把不切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④。福泽谕吉对教育转向的把握和判断是敏锐而又准确的，在当时也是有着世界性眼光的。

考察人类的教育实践，我们发现，自从英国社会于18世纪60年代开启了人类社会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闸门，

①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页。

②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④ 同上。

近代以降的哲学观、知识观和教育观就发生了实践哲学的根本转变。实践哲学宣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这种实践的哲学观和知识观应用到教育上，就是教劳结合的新教育哲学，也即一种能够“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②的实践教育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教育哲学，知识主要不再是艺术的、美学的和静观的，而是科学的、实用的和运动的，知识的教育也不再是静止的、以书本为中心的，而是动态的、结合了学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福泽谕吉的实学教育观正是迎合了这一浪潮，他的实用知识已经不仅是日常实际需要的知识，而且包含了实验、实践的科学知识。

综上所述，日本教育的近代化实践进程就在福泽谕吉这一极具包容性的“和魂洋才”的教育思想理论中悄然开始了，这一教育理论开启了日本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之轮，使得日本社会爆发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日本就完成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事业，表征于军事成就上，终至于在甲午海战中一战即击败了中国海军。

二、古典书院的终结

如果说上文论述的历史条件造成了中国古典书院转向的紧迫情势，使得后来书院向大学转型成为历史的事实，那么如何从理论的高度解释这一事实呢？也许，哲学上的“终结”概念对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有着有益的启示价值。详查人类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所谓哲学的“终结”实在具有多重意蕴：相对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思辨哲学，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哲学的转向；相对于机械和静止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是怀特海有机、恒变、过程的哲学的开始；相对于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是杜威经验的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